

# 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界说<sup>\*</sup>

王兴科

(辛亥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 武汉 430060)

**摘要** :首义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 ,可定义为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和 ,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首义文化的面貌由其本质所规定。这个本质 ,即武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 ,亦即推翻君主专制 ,创建民主共和。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核心内容 ,是最能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首义精神在学术界颇受关注 ,以著名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论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首义文化资源是相对于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言的首义文化。首义文化资源属性为人文资源。按形态 ,可分为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直观性、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再生性 ,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则具有无形性、传承性与共享性。

**关键词** :首义文化 首义精神 首义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0730(2006)10- 0113- 07

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过去了将近 100 年之后 ,在今天的湖北武汉 ,因政府倡导和媒体传播 ,人们对诸如弘扬首义文化、发扬首义精神、保护和开发利用首义文化资源、精心打造首义文化品牌这样的话语已非常耳熟 ,但深究何谓首义文化、首义精神 ,首义文化资源何所指 ,则或语焉不详 ,或言人人殊。弄清基本概念的基础性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保护、传承和弘扬首义文化 ,尤其是对于方兴未艾的首义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均有意义。本文试图以已有的认识为基础 ,对首义文化及相关概念予以界说。

## 一、关于首义文化

说到首义文化 ,既往似乎只围绕着首义历史遗址及纪念设施在作文章。所谓保护 ,只限于对历史建筑的修缮 ;建设 ,则无非是添建点新的纪念设施 ,而开发

利用 ,也就是餐饮一条街或某个住宅小区冠以“首义”之名。这样单一的举措与对首义文化内容的片面认识不无关系。无可否认 ,首义遗址及纪念设施是首义文化的重要部分 ,然而 ,它们并不是全部。首义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具体而言 ,除首义遗址及纪念设施外 ,诸如首义文告 ,首义旗帜 ,志士诗文 ,黄帝纪年与公元纪年 ,以及剪辫子等 ,亦均为首义文化。从文化的层面 ,又可分出政治、文艺、文物、制度、习俗等。概而言之 ,首义文化包括了整个首义历史 ,亦即首义志士的全部活动 ,以及首义历史或首义志士活动的遗存。在首义文化的全部内容中 ,本质和核心的内容则是武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 ,以及首义志士为达至目标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精神质素。综上 ,我们似可得出首义文化的一般性定义 ,首义文化即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和 ,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

首义文化的面貌由首义文化的本质所规定。这个

本质,即武昌首义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亦即推翻君主专制,创建民主共和。武昌首义达至了这个目标,成就了中国历史划时代的进步,从而也使首义文化与其他历史文化区别开来,并使首义文化具有革命性与进步性。

众所周知,武昌首义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进行的。早在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即强调了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sup>[1]</sup>。黄兴在日本留学时,在那里学习到的西方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鼓吹者<sup>[2]</sup>。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并由黄兴及湖北辛亥志士曹亚伯等附议,决定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入盟同盟会的誓词,这个誓词同时也就成为革命者建造共和国的纲领。武昌首义正是按照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推进的。首义成功后建立政权的名称即按同盟会的规定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实际上是同盟会预拟的文告之一。在发布的一系列文告中,鄂军都督府明确宣告“以共和政体建设民国为宗旨”<sup>[3]</sup>,或曰“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国”<sup>[4]</sup>。首义志士,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居正,1946年纪念首义时写过一篇杂谈,它反映了一个身与其役者回望首义历史的文化思考,他说:“我们把古往今来的中外历史翻阅一遍,一定可以发见历史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人类得到安全,得到保障,得到平等,得到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这个方法,就是‘天下为公’之一大要义”<sup>[5]</sup>。“‘天下为公’一大义,既然深深贯注于革命同志的内心底里,无丝毫假借之迹,所以临到首义那一天,个个奋勇争先,没有一个畏葸退避,因之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终抵于成,这无非是一种明确的信念驱使之然,岂有他哉!果使‘天下为公’的方法,撮其要衍为政治,便是‘民主’‘共和’,亦即‘全民政治’”<sup>[6]</sup>。2004年,在武汉市政府主持召开的“弘扬首义文化暨首义文化园建设方案研讨会”上,与会的全国著名近代史学者亦认为首义文化的本质是民主共和。甚至有学者提出:“如果南京可以定位为博爱城的话,那么武汉则可定位为共和城”<sup>[7]</sup>。此议不无创意,似可信可采也。

首义文化不是凭空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总是

发生、发展、嬗变在一定的时空。由此,则可探究文化的源流,并进而认识其特性。

一方面,首义文化是所在地域历史文化的延伸,或者说传承。湖北武汉是荆楚文化之乡,这里的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以它鲜明的地域特色区别于其他文化并以之丰富中华文化。荆楚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五句古语来概括,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sup>[8]</sup>“抚有蛮夷,以属华夏”<sup>[9]</sup>“不鸣则已,一鸣惊人”<sup>[10]</sup>“楚虽三户,亡秦必楚”<sup>[11]</sup>“惟楚有才,深固难徙”,对应现代词语,似可依次用创业、开放、求新、尚武、爱国来表述。如果说,楚国先民是以其禀赋和特质于蛮荒中开疆拓土,从而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那么,辛亥年间的首义志士也是以这些基因熔铸了他们的人格,从而创造了划时代的壮举。譬如说爱国爱乡之情,没有比20世纪初年游学海外湖北学子更浓烈的了,他们招“楚魂”,发“汉声”,自问自责“吾侪而无进步,则内地岂待问耶?吾侪有进步,而坐视内地之无进步,岂非放弃责任之甚也”<sup>[12]</sup>?并大声疾呼:“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sup>[13]</sup>“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sup>[14]</sup>“欲挽此劫运,若补漏舟,若救火炉,苟非具有武健果毅之气概,伟大磅礴之精神,恺切诚挚之肝胆,明敏活泼之脑浆者,不能使中国之国旗,仍翻飞于二十世纪之大活动场也。今日中国之负此资格造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sup>[15]</sup>这不啻是爱国爱乡之情,还是责任与使命。再如尚武传统。武昌首义在形式上是新军起义,而实际上则是秀才造反。那些游学海外归来,或在武昌新式学堂毕业的两湖青年学子,在接受了新的思想和知识之后,面对满清末年的困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基因迅速在他们的身体里复活:“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成为他们的共识,他们纷纷脱下长衫,投笔从戎。吴禄贞是一个典型。他游学日本归来,即投入军中,以武昌花园山聚会联络同志,并确定“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sup>[16]</sup>。李廉方曾追述这段革命之缘起,他说,大家“详加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于是,胡瑛、张难先

投工程营为兵,运动同伍,密散革命书册。是时秀士入营者颇多,如朱元成、范腾霄、曹进等皆是,刘静庵则已在马队营入伍矣<sup>[10]</sup>。正是这些投入营中的青年学子“耻声华,厌标榜”,埋头苦干,实行“抬营主义”,使湖北新军革命化,方“一鸣惊人”,首义成功。

另一方面,首义文化也是所处时代西方文化外铄的产物。以武昌首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有史以来革命的面貌。此前几千年,所谓革命,不外乎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义,进行改朝换代。太平天国洪秀全披一袭舶来的宗教外衣,也只是企图建立洪姓一家的天下。而辛亥革命则不同,孙中山举起的是西方民主革命的旗帜,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由此,首义文化也就具有了全新的面貌。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首义志士熊秉坤,在谈到武昌首义原因时曾说:“吾国革命之远因甚多,可总结欧力东渐一语<sup>[11]</sup>。东渐‘欧力’他未解释,想来除坚船利炮外,当包括了西方思想文化。

武昌首义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大有关系的。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兴革,也不外借助“欧力”,当然按他的“中体西用”,他把“欧力”只限在“用”的层面。而他始料未及,他在客观上却促成了荆楚文化的近代转型,并为武昌首义奠下了根基。所以到了1945年双十节,首义志士张难先,还撰文盛赞张之洞,尽管名为笑谈。他说,张督鄂十七年,“一方面发扬固有之声教,一方面追逐欧美之文明,合冶中西学说,其势突飞猛进。两湖人士在张氏领导之下,新旧知识皆极充足。尤其铁政、枪炮、钢药、钱币等局厂,张氏以全力赴之。物质进步,全国无两。所以辛亥楚人一呼,尽借张氏之缔造,以成不世之伟业<sup>[12]</sup>。

湖北留日学生张继煦,在《湖北学生界》创刊号的《叙论》中,把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荆楚文化的转型说得更明白。他深得列强竞争与文明发展关系的要义,指出自汉口开埠以来,“吾楚”已成为西方列强“势力上竞争之中心点”、“经济上竞争之中心点”、“扬子江航路竞争之中心点”、“铁路竞争之中心点”,进而认为“吾楚”为“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在《叙论》的结尾,张继煦甚至预言《湖北学生界》

这一刊物“庸知‘其’不为启山林之筭路蓝缕也”;<sup>[13]</sup>“二十世纪之中或因此而增一纪念物焉”。张之所言不妄不虚,武汉在20世纪初年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中心,随之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张继煦辈首义志士,亲身创造了首义历史与首义文化。《湖北学生界》正如他所言自“二十世纪之中”以来即陈列在博物馆里供后人纪念和瞻仰。

总之,首义文化是荆楚文化与西方文化合流的产物。如果说,首义文化在纵向上是荆楚文化的延伸与传承,那么在横向上则是西方文化的外铄与熔铸。天运辛亥,江汉之会,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点上,首义枪声震惊世界,首义文化光耀人寰。赓续了荆楚文化,首义文化有历史性和地域性,融汇了西方文化,它又兼具世界性和现代性。文化是一条条河流,润泽了自己的流域,走向是百川归海。武昌首义开辟了“吾楚”走向世界的入口,首义文化是“吾楚”走向世界的名片。

## 二、关于首义精神

首义精神是首义文化的内容之一,并且是它的核心的部分,是最能凸显首义文化人文特质的部分。本文专题界说首义精神,也因为首义精神是说到首义历史和文化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

和首义文化基本概念研究较少的状况不同,首义精神在学术界还是颇受关注的,既不乏著名历史学者、文化学者概括性的表述,也不乏中青年学者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介绍五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最有影响的首义精神论是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下先说。他对这个论题并无专文展开论述,但他在有关文章中,特别是在各种相关场合的演讲中,总是大谈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并强调这种精神的现代价值。

二是冯天瑜的观点。在2001年武汉市纪念辛亥首义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在谈到首义精神的内涵时,他概括了三句话,即敢打敢拼、不畏牺牲的铁血精神,不拘教条、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团结进步、振邦兴乡的爱国精神<sup>[14]</sup>。

三是陈望衡的概括,他说了八个字,即“敢为人

先,砥柱中流<sup>[15]</sup>。他这个概括是对首义精神的间接表述,他是在阐述武汉历史文化精神时作这个概括的,而他认为,首义精神与武汉历史文化精神一致。

四是罗福惠的论述。他对首义精神有两方面的论述,关于首义精神的概括,他从历史上湖北武汉经济、文化的位次,概括了两个字:赶超,内涵是不甘人后,后来居上<sup>[16]</sup>。关于辛亥首义志士对荆楚文化精神的发掘、继承和提升,他则归纳了四点:首先表现为爱国爱乡的炽热情感;其次是为追求理想而不懈探索并勇于接纳新知的襟怀;再次是反抗强暴、卓厉敢死的斗争勇气;最后是“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升华<sup>[17]</sup>。

五是黄春华、王强的“五种精神”论。他们把首义精神表述为“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振兴乡邦的爱国精神、通力协作的团体精神和不计生死的牺牲精神”<sup>[18]</sup>。

此外,笔者见到过上世纪 40 年代首义志士的首义精神论,这里介绍二种。一是张难先谈的首义精神,他概括为四点,即勇敢、廉洁、公正、恬淡<sup>[19]</sup>。二是徐源泉的,他认为“可就动静两方分析,动的革命精神,为壮烈之牺牲,……静的革命精神,则为守纪律尚廉洁之美德”<sup>[20]</sup>。

总的看,上述首义精神论认识也还基本趋同,内涵应该说都揭示了,概括表述也较精练准确。如果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同角度的视点与论述,不同的表述与概括,百花齐放,这是学术繁荣和健康的标志。而首义精神论的研究似乎有所不同,这里涉及一个社会应用的问题。如用于社会的宣传和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即必须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说法。这就使得首义精神论的研究必须寻找共识并追求认同。

就已有的首义精神论的论点来谈论点,是不便于形成共识并得到认同的。而立论的基本考虑,则为我们研究、概括并认同首义精神论提供了基点和参数。笔者以为有四点必须注意并考量的。一是必须源于历史,即首义精神必须源于首义的历史,亦即由首义志士的活动(包括思想与言论)而提炼;二是必须合于源流,即与荆楚历史文化的精神一脉相承;三是必须独具特色,即必须区别于其他不同文化源流的精神;四是这种精神必须回应现实的诉求,或者说具有

现代价值。

基于以上四点,本文认为章开沅提出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认同的。下面就上述四个方面来谈敢为天下先说。

首先,敢为天下先说源于首义历史。按敢为天下先的语词,本意是敢于居于天下人之前,换言之即敢于走在人前,为别人之不敢为。就精神层面而言,则表明的是自信心、责任心和勇气。查文献记载,敢为天下先这个语词最早见于老子《道德经》,老子是反其意而用之,曰“不敢为天下先”,与“慈”、“俭”并用,作为保全其“道”的三件法宝。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即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亦即不求争先但求退让,这是老子一贯的避世的、消极退让的文化或者说哲学。然而,在中国先秦以降的思想文化史上,入世的、积极进取的、敢为天下先的观念,始终居于主导和主流的地位,并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辛亥首义志士也是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的衣钵,而勇于负起了国家民族的责任。前述游学日本创办《湖北学生界》的湖北学子,他们在抉择“待学之成而以济中国之急”和“不能待学之成而急为输入之计时”,他们记起了庄生的寓言故事:臧与获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获奚事,则博塞以游。操业不同,而失羊则均。因而反躬自问:“今之闭户自精而漠然于国事之缓急者,几何而不为庄生之所讥也”<sup>[21]</sup>?从而,他们走上前台,站到时代的前列,创办了第一个以省区命名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正是以同样的精神,首义志士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和一夜血战,应验了黄兴的诗句“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sup>[22]</sup>,赢得了孙中山给予的“首义之区”和“第一枪”之美誉和褒扬,并且随即又创出多个“第一”:创建了中国乃至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第一次以选举而不是世袭或分封产生政权的首脑,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共和政治为原则的民主宪法,即《鄂州约法》,等等。所有这些,说明敢为天下先说源于首义历史之不虚也。

其次,敢为天下先说合于源流。这个源流,即是荆楚历史文化的精神。上节讨论首义文化的源流时,我们说首义文化是荆楚文化与西方文化合流的产物,具

体而言,如果说西方文化给首义文化打上了民主共和本质的烙印的话,那么则可说是荆楚文化给首义文化遗传以精神基因。这种人文基因,源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积淀,不会轻易改变。古楚人的“筚路蓝缕”、“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今鄂人的“中部崛起”、“抢前争先”,以及汉上横渡长江运动最响亮并已喊向世界的口号“抢渡”,无不与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合韵合拍。再如古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力透纸背的是自信心、责任心与勇气,对照首义志士熊秉坤指挥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前一刻与队官罗子清的对话,时隔两千年,居然一样的口吻。“(罗)曰:能得成功乎。‘坤曰:天下形势,要算湖北,自海通以来,经济、文化、交通、人材均集中武汉,湖北一起义,天下风从,乌得不成功乎’<sup>[23]</sup>。文化、精神的历史律动和一脉相承,令人惊叹!

第三,敢为天下先说独具特色。精神有源流和传承,有交融和汇流,但其可称之为精神者,一定有其人文的特质,而独具一特色,并与另一可称之为精神者区别开来。我们说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肯定是有区别的,可能有的强调艰苦奋斗,有的突出创业,有的讲时间和效率,有的是团结协作。这就是人文特质,也就是特色。由此,也看出一种精神的特色是简约的,而不是庞杂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论既独具特色,也有简约的特性。要说明的是,特色和简约并不是指精神内涵的单一。如首义精神和重庆红岩精神,爱国、团结奋斗应是这两种精神均具有的内涵,然而,这些却不成其为各自的特色,使二者区别开来的,前者是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心、责任心和勇气,后者则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或曰勇于牺牲,在烈火中永生。

第四,敢为天下先说回应了现实的诉求,或者说具有现代价值。历史是必须为现实服务的。只有在今人心中能激起回应的历史,才是有价值 and 意义的历史。我们今天所呼唤的首义精神,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精神,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在今人心中的回响。故此,首义精神必须有现代意义,其概括和表述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惟有如此,才能激励今人,让历史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强调建设创新型社会和国家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今天,敢为天下先的自信心、责任心和勇气,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和今天的时代精神合拍的。楚文化史学者张正明在谈到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时指出:“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sup>[24]</sup>首义文化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它们的精神一脉相承,其精神的现代价值亦可等量齐观。

### 三、关于首义文化资源

首义文化资源是相对于保护和开发利用而言的首义文化。换言之,首义文化资源与首义文化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这是一个着眼首义文化价值的现代概念。

提出文化资源的概念是人们认识的进步,并且具有重要意义。资源的概念原来是严格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并且主要是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资源的概念才引入人文领域,人们这才发现,历史、文化、艺术这些人文的东西,也是可以作为资源看待而用作精神产品生产的,并且,还可以用以解决经济发展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系列难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谈到西部开发中的文化资源问题时即指出:“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人文资源的认识”;“人们将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我们的惟一目的,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原有的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因此,对“西部许多宝贵的传统文化艺术”,他主张作为“重要的资源”来看待,“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因为它不仅是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sup>[25]</sup>。提出首义文化资源的概念,其意义与提西部文化资源概念相同。

首义文化资源属性为人文资源。其有别于自然资源之处首先是来源。自然资源是天然的,而首义文化

资源则是人为的,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其次是形态和自然资源也有不同。自然资源通俗地说即是物质资源,也就是物质形态;而首义文化资源作为人文资源,其形态则可分为物质和非物质形态(或有形和无形形态,显性和隐性形态)。如首义文化资源中的历史遗址和文物,为物质形态;而首义历史、首义精神,为非物质形态。形态分析是认识特性的前提,也是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基础。下面按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分类认识首义文化资源。

前述首义文化本文定义为首义历史及其遗存的总和,并且主要是着眼于人文特质认识的首义历史。由此,首义文化资源的主要存在形态则是非物质的。这种首义文化资源包括了整个首义历史,亦即首义志士的全部活动,并且主要是武昌首义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以及首义志士为达至目标所表现出来的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这是首义文化资源的主体部分和核心。

首义文化资源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即物质形态,这主要是指首义历史或首义志士活动的遗存。这其中又可分为三类,一是首义历史的遗址遗迹,即首义志士活动或事件发生的地点或场所,如新军工程八营旧址、楚望台军械库遗址、起义门等;二是首义历史文物,即首义志士活动的遗物,如首义十八星军旗、首义文告、汉阳造步枪等;三是首义纪念设施,即为纪念武昌首义而修建或设置的设施,如首义公园、孙中山铜像、辛亥革命博物馆、首义广场等。这种首义文化资源尽管并非主体部分,但却是显而易见的部分。

和其他人文资源一样,首义文化资源的两大部分因存在形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性。

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首先具有直观性。一个遗址遗迹,一件文物,一个纪念设施,都具有物化的形态,都可以显而易见。其次是不可替代性。即此遗址遗迹、此文物、此纪念设施,都是唯一的。第三是不可再生性。一个遗址上的建筑毁了重建,此遗址已非彼遗址;一件文物毁了仿制或复制,则已非文物;一个纪念设施拆了重建,亦非再生。认识了物质形态首义文化资源的直观性和不可替代性,则在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播、纪念仪式的举办以及旅游

接待等活动中,当应注意发挥这种资源的特殊作用。曾有许多原籍大陆来自台湾的国民党老兵,在瞻仰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时热泪盈眶,孙中山之子孙孙治强参访红楼后当即挥毫题词“民国之门”,即是这种资源直观性、不可替代性的冲击力、感染力所致。认识了这种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则当尽力采取保护措施,使其长久存在以供永续利用。

和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不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较多特性,有学者专门著文研究过非物质形态文化资源的特征,其归纳为无形性、传承性、稳定性、共享性、持久性、效能的最大性、递增性等<sup>[29]</sup>。具体到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本文认为主要特性有三:

一是无形性。武昌首义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不能重现。武昌首义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与建构,以及首义志士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则是观念、精神形态的存在。历史可以重温,观念、精神可以认知、领悟,也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述,但它们终归是隐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然而,这种无形的资源,却有潜在的、巨大的功效,尽管其作用方式是间接和潜移默化的。

二是传承性。本文前两节谈首义文化和首义精神都说到了它们的源流,由此,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也就具有了传承性。这里的传承性又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客观存在。历史就是历史,武昌首义民主共和的本质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虽说是学人的认识和概括,但只要这种认识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也就可能在尽可能长的时间段里成为共识。其次,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历史的积累与继承。历史不能割断,否则一种文化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第三,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也有延续的问题,或者说发展、创新的问题。对首义历史、首义文化、首义精神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的认识总是愈来愈接近真实、本质和核心。文化是在使用中延续的。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不同,文化资源的使用不会造成资源的消耗,而是再生再造,甚至产生新的文化特质。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发展与创新,其取向是一致的。

三是共享性。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较之自然资源以及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具有明显的共享性。自然资源除了苏东坡说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以及阳光、空气这类资源外,其他是“物各有主”,即均有明确的产权归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也有产权归属,如一件文物,即可能是某人所有,秘不示人的。而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则不同,只要你认识它,只要你愿意,你就可独占独享,也就是人人可享。尤其是当今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知识、文化的共享已具备了无限大的可能性。可以预期,借助新科技的媒介,首义文化将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首义文化不仅属于湖北武汉,而且也会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珍视的遗产或财富。

\* 本文为 2006 年度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首义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对策研究》子课题之一。

注释:

- [1]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 1976 年重印本,第 36 页。
- [2]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5 年版,第 5 页。
- [3]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 页。
- [4]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 593 页。
- [5] 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辛亥首义史迹》,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第 1 页。
- [6] 王兴科《精心打造首义文化品牌》《辛亥革命研究动态》2004 年第 1 期。
- [7] 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创刊号。
- [8]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 2 期。
- [9]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台北)第 2 辑第 113 页。

- [10]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 4 页。
- [11] 熊秉坤《武昌起义谈》《辛亥革命》(五)第 85 页。
- [12] 张难先《武昌首义与张之洞督鄂去鄂及其死》,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25 页。
- [13] 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创刊号。
- [14] 罗盘、王志荣《铁血染得山河碧——武汉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活动巡礼》,人民网 2001 年 10 月 10 日。
- [15] 陈望衡《敢为人先砥柱中流》《长江日报》2001 年 8 月 8 日。
- [16] 《楚天都市报》2001 年 5 月 1 日“首义专刊”。
- [17] 罗福惠《荆楚文化精神在辛亥时期的继承和提升》《光明日报》2004 年 6 月 1 日。
- [18] 黄春华、王强《论首义精神》《江汉论坛》2001 年第 3 期。
- [19] 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辛亥首义史迹》,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第 15 页。
- [20] 徐源泉《继承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完成建国使命》,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辛亥首义史迹》,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第 29 页。
- [21] 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创刊号。
- [22] 黄兴《和谭人凤》《黄兴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72 页。
- [23] 熊秉坤《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武昌首义》第 2 册,第 286 页。
- [24]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荆楚文化网 2005 年 2 月 7 日。
- [25] 费孝通《西部开发中的文化资源问题》《文艺研究》2001 年第 4 期。
- [26] 吴圣刚《文化资源及其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 木)